

丁玲创作论

邹午蓉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丁玲创作论

邹午蓉

江苏教育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 003 号

丁玲创作论

作 者 邹午蓉

责任编辑 任 晖

出 版: 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发 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金花园轻印刷中心

印 刷: 江 浦 第 二 印 刷 厂

(江浦县珠江镇东门外, 邮政编码: 2118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5 印张 8.625 字数 208,600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345-2241-3

G·1998 定价: 4.50 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陈 迈

撰写、出版一部《丁玲创作论》，是完全必要的。

丁玲既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女作家，也是当代文学史上的杰出女作家。她的创作历程长达六十年。缺少了对丁玲创作的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就是不完整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丁玲创作的研究，单篇的论文、片断的述评多，专门研究丁玲创作的著作还不多见。邹午蓉的《丁玲创作论》，全方位、多角度、系统地研究了丁玲的创作，对丁玲的创作历程作了新探索。单就这一点而言，邹午蓉的专著《丁玲创作论》，就已为丁玲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对于作家来说，最可贵的，是在于他对生活（包括历史）有新的发现。如果作家没有这样的对生活的新发现，作家休想在文学史上留下地位。对于文学研究家来说，则在于他对作家、作品是否有新的发现。如果文学研究家没有这样的对作家作品的新发现，他的研究论著也不会有多高的学术价值。《丁玲创作论》的可贵处，正在于邹午蓉的这部著作对丁玲的创作有较多的新发现。她发现，《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具有现代意识的恋爱观，具有现代性爱意识，具有以女子为独尊的女性意识，是“在黑暗中苦闷徘徊的典型”；她发现，长篇小说《母亲》中于曼贞形象的出现，“填补了从林黛玉到‘五四’新女性之间人物画廊的空白，为

中国文学女性人物长廊里增添了一个不可多得、值得珍视的艺术形象”；她发现，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丁玲在赞扬贞贞“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的同时，还对霞村的封建意识、封建道德进行了暴露和批判，执行了反封建的使命；她发现，《在医院中》这篇作品的“着力点并非在反官僚主义或小生产习气，而在于强调知识分子如何正确认识、对待和改造环境”；她发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突出成就是“写出了中国农民‘翻心’的艰难历程”……这些对丁玲作品的新发现，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都是邹午蓉深入研究丁玲作品的文本、思想、艺术后所得出的新认识。

邹午蓉之所以对丁玲创作有如许新发现，除了得力于她辛勤收集丁玲作品的各种文本、有关资料并对文本和大量资料作了精心研究外，还因为她在研究工作中熟练地、得当地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丁玲早期作品与冰心、庐隐作品和鲁迅《伤逝》的比较，丁玲的莎菲型女性的崭新的精神内质被展示得一目了然，“以其黑暗中不失憧憬热望，感伤中透射出反抗追求的独特面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通过对丁玲作品题材变化的比较，可以见出丁玲创作的不断转型与发展；通过对丁玲先后运用的不同创作方法的比较，能够看出丁玲由“向内转”，而“向外转”，由心理现实主义而革命现实主义，由欧化痕迹颇为明显而回归传统借鉴创新的艺术特色；通过对丁玲晚年作品与“伤痕文学”的比较，更可看到丁玲作为老一辈革命作家的思想高度和宽广情怀，等等。比较的方法，也就是在同中见异、异中见同的比较中揭示事物本质特征的方法。邹午蓉在《丁玲创作论》里成功地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因而才有她的一系列对丁玲创作的新发现。

丁玲的一生既是传奇性的，又是坎坷曲折的。当她以《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饮誉中国文坛时，她才是一位二十三四

岁的青年女作家。她二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肩负起左翼文艺的领导重任。1933年，在她二十九岁时，丁玲突然遭受国民党特务的绑架，从此被囚禁三年。1936年，她奇迹般地逃脱魔掌，进入陕北苏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曾赋《临江仙》词一首赠给丁玲，称誉她“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赞颂她“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其后，她担任过中央警卫团的政治处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活跃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写出了《我在霞村的时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等许多著名的小说和纪实文学。解放战争时期，她又亲自参加土地改革斗争，写出了不朽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新中国成立不久，她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苏联斯大林文学奖。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杰出的革命女作家，~~1957年~~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的首分子。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从此她沉沦底层长达22年，受尽迫害、~~摧残、侮辱、蔑视~~！倍尝人世艰辛。在她得到平反昭雪后，丁玲在生命的最后七年里，写作并出版了《在严寒的日子里》等八本书共九十万字的新作。1986年3月4日，她以八十二岁高龄溘然逝世。新华社播发的《丁玲同志生平》中说“她的名字和作品，曾吸引和鼓舞许多青年走向革命，其影响远及海外”；“她的光辉业绩，必将镌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史册上”。对于这样一位稀见的革命女作家，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她，逮捕她，攻击她，并不奇怪。但在我们自己的阵营里，丁玲也曾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相反却遭到不应有的诋毁。她的优秀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作为“毒草”受到公开批判；她的经典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度被查封，禁止出售。这是从“左”的方面对丁玲创作的歪曲、贬抑和压制。新时期到来后，有了对丁玲的认真研究，丁玲得到了公允的评价。但在资产阶级错误文艺思

潮的冲击下，又有人按照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片面拔高丁玲参加“左联”以前的作品，而对丁玲参加“左联”后写作的《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水》等出色作品，特别是对丁玲进入陕北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重大作品，一概贬之为公式化、概念化、模式化的作品，其旨归则在于否定左翼文艺的重大成就和解放后、新中国革命文艺的巨大成就。对于在丁玲创作评价上的“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丁玲创作论》从丁玲的创作实际出发，既反“左”又反右，鞭辟入里地揭示了丁玲研究中这两种倾向的错误实质，捍卫了丁玲创作的崇高声誉。但是，《丁玲创作论》没有给别人打棍子、扣帽子，而是通过“百家争鸣”指出了这两种倾向的错误所在。这又是《丁玲创作论》与时下某些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对不良倾向“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的调和、折中的调和态度大不一样的。可以说，在学术研究和论争中批“左”反右，是《丁玲创作论》的又一显著特色。

《丁玲创作论》并不回避丁玲研究中的难点。在“反右”斗争中，丁玲被作为“自首变节分子”受到严厉批判。关于这一问题，党中央组织部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已经予以彻底否定。无论是我们党组织所掌握的材料，还是在敌人的档案里或原是国民党特务的交代材料中，都没有发现丁玲同志在三年囚禁期间有过任何“自首变节”和出卖同志的行为。过去把她作为“自首变节分子”来进行批判，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丁玲同志在被囚禁的三年间，曾和叛徒、丈夫冯达同居，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是不是予以回避？《丁玲创作论》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精神评述了这个问题。在邹午蓉看来，因为丁玲同志在囚禁期间曾和原来的丈夫冯达同居而像那些“左派”那样把她定性为“叛徒”是毫无道理的。丁玲既没有自首变节，又没有出卖同志，何“叛徒”之有？邹午蓉引用了丁玲同志手写的回忆录中的一段话：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到底也还是一个人，总还留有那末一点点人的自然而然的求生的欲望。我在我的小宇宙里，一个冰冷的全无生机的小宇宙里，不得不用麻木了的、冻僵了的心，缓解了我对冯达的仇恨。在这山（指莫干山）上，除了他还有什么人呢？而他这时只表现出对他自己的悔恨，对我的怜悯、同情。我只能责备我的心肠的确还不够硬，我居然能容忍我以前的丈夫，是应该恨之入骨的人所伸过来的手。谁知就由于我这一时的软弱，麻木，当时，以后，竟长时期遭受某些人的指责与辱骂，因为我终于怀了一个孩子。我没有权力把她杀死在肚子里，我更不愿把这个女孩留给冯达，或者随便扔给什么人，或者丢到孤儿院、育婴堂。我要挽救这条小生命，要千方百计让她和所有的儿童一样，正常地生活和获得美丽光明的前途，我愿为她承担不应承担的所有罪责，一定要把她带在身边，和我一起回到革命队伍里。这是我的责任、我的良心。哪里知道后来在某些人心中，这竟成了一条‘罪状’，永远烙在我身上，永远得不到原谅，永远被指责。”邹午蓉就此写道：“从这段无奈、自责交织着痛苦、愤懑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坦率、真诚，是一颗滴血的母亲的心，每一个有‘人性’，有‘良知’的人，读了这段和着血泪的文字，难道能不‘黯然良久’，不为作家的勇敢坦诚深深感动吗？愿人间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同情，多一些爱！”丁玲同志没有回避她与冯达同居的问题，邹午蓉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丁玲同志的自我解剖解剖得好，邹午蓉对这一问题的评述也评论得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怎能因为这一点把丁玲同志定性为“叛徒”呢？又怎能因为这一问题而否定丁玲同志的全部创作呢？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的自由度也扩大，这是好事。但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有的人只求研究成果的经济价值，而不考虑社会效果。在一部名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的丛书中，竟把茅盾排除在“文学大师”的名单

之外，同时又把通俗文学作家金庸（我们不否认金庸的通俗文学成就）排在第四位，置于老舍、郁达夫之前。现代文学研究成了某些人可以任意转弄的“魔方”。在这一情况下，《丁玲创作论》的出版，更有其激浊扬清的作用。

我和邹午蓉女士本不相识。1980年冬，我在《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头条位置上读到她的《试论丁玲1942年之前的小说创作》一文，当时我为该文立论的新颖，学力的深厚，论证的严密，文字的隽永而心许不已。后来经友人介绍，才和邹午蓉女士认识，得知在1980年时她才37岁。十四年来，她在丁玲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中成果迭出，有了长足的进步，快速的提高，成了丁玲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丁玲创作论》便是切实的证明。我衷心祝愿她在今后现代文学研究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目 录

第一章	怎样与文学结下“缘分”	1
	童年的孕育	1
	时代的造就	7
	别无选择的选择	11
第二章	在黑暗中的莎菲女士们	18
	一个“娜拉”的悲剧	18
	叛逆女性苦闷的绝叫	22
	徘徊无路的莎菲姐妹	36
	多元开放的小说艺术	43
第三章	创作的转变与发展	57
	突破“危机”的酝酿	57
	从恋爱跨到革命	61
	从知识女性的控诉到农民工人的抗争	69
	转变和前进中的偏失	79
	前代女性的挣扎与憧憬 ——《母亲》	86
	魍魉世界中的意外收获	96
第四章	抗日烽火里的新篇章	106
	飞向自由的天地	106

抗日文学的新开拓	114
在艰苦中成长的新人	124
大时代的真实记录与报告	140
第五章 农村题材的优秀作品	152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黄土地上结出的硕果	152
中国农民翻身与“翻心”的艰难历程	161
原汁的生活与活动的人群	174
回归传统借鉴创新的艺术特色	189
第六章 度尽风雪绽放的新花	198
跨到新的时代来	198
漫长的噩梦	203
风云突变的桑河原野	
——《在严寒的日子里》	209
历史长卷中的馨香篇页	216
诗意更浓情意更深的散文特色	233
附录 新时期丁玲作品评论目录索引	242
后记 一本迟写的书	266

第一章 怎样与文学结下“缘分”

童年的孕育

1927年底，一颗新星在中国文坛的上空冉冉升起，光华璀璨，耀人眼目，她，就是丁玲。五十多年后，因文学而数度获罪、历尽磨难的女作家前去探视德高望重的文坛“伯乐”叶圣陶先生，谈到当年叶老从一大堆无名作者的来稿中发现了她的处女作，并刊登在《小说月报》的卷首时，不禁感慨万千地说：“叶老，我常常告诉年轻的编辑同志，您当时怎样给我提意见，指点我怎样修改自己的小说。我又想，要是您不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不至于受这许多折腾了。”^①对于恩师的慧眼识才、提携后进的感激之情交织着劫后余生、欲说还休的百般苦涩滋味。文学，让她付出的代价毕竟过于高昂、过于沉重了。一向心平气和、淡泊自处的叶老对于丁玲的来访不免喜极难眠，吟成《六么令》一首相赠：

启关狂喜，难记何年月。相看旧时容态，执手无言

说。塞北山西久旅，所患惟消渴。不须愁绝，免毫在握，
赓续前书尚心热。

回想时越半纪，一语弥深切。那日文字因缘，注定
今生辙。更忆钱塘午夜，共赏潮头雪，景云投辖，当时
儿女，今亦盈颠见华发。^②

那日的“文字因缘”，注定了丁玲一个浪来被托上云霄，一个
波去又被沉入海底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人生道路，是叶老促
成了这段“文字因缘”。比起虽九死而无悔的先贤三闾大夫屈原，
丁玲似乎对从事文学创作颇有悔意。然而，当她一旦获得重生，激
情又如火山喷发、江河奔涌，以高龄之年、带病之身“赓续前
书”，向读者奉献了数量可观的新作。文学，真是一样怪东西，让
人又爱又怕、难舍难分。丁玲这种剪不断、抛不开的文学“情
结”，也许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是一种“缘分”吧！

这种“缘分”其实从她的孩提时代起就孕育着了。

1904年10月2日（清光绪30年农历9月4日），丁玲出生于
湖南省临澧县（旧称安福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原名蒋
伟，字冰之。笔名有丁玲、彬芷、丛喧、晓茵等。蒋家四代在朝
廷为官，是湖南有名的豪门望族。丁玲的祖父曾做高官，在故里
买田造屋，创下一份大家业，但在三十五岁的盛年即告谢世。到
了丁玲的父辈，家大业大的蒋家已是一派败落之象。大伯父和丁
玲之父皆英年而死，二伯父出家当了和尚，而一个叔叔竟上山落
草做了强盗。子弟们声色犬马，吃喝嫖赌，树倒猢猻散。

丁玲的父亲蒋浴岚是个典型的世家子弟、浪荡公子。他不乏
聪明才智，十几岁就考中了秀才。辛亥革命前维新思想高涨，出
国留学成风，他也随大流赴日留学，攻读法律。然而他生性散漫，
耐不住寂寞清苦的学生生活，加之体弱多病，学业未成而归。这
位大家公子一生意志消沉，无所作为，没有从事过正经职业，靠

着祖上遗下的产业，一味地挥霍享用，后又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刚过而立之年就染病而亡，家产也几被荡尽。丁玲在其父留日期间出生，而1908年父亲辞世时，她还不到四岁。对于丁玲来说，父亲只是一个朦朦胧胧的记忆，一个儿时的梦。她是从他所遗留下来的那些象征昔日荣耀的衣服饰物上，从母亲和他人的议论中认识 and 了解父亲的。三十年代，丁玲曾这样谈到自己的家世和父亲：

我的家庭，现在还有三千人——远近亲戚都在内——家庭中一切人，彼此都十二分亲近。家中总还算有许多钱，我的祖父，曾做过很大的官职。我在家里看到父亲保留下许多荣耀的衣服饰物。可是我的父亲在一种有趣之下，把家产又都用光了。自父亲死后，那时我还很年幼……连父亲的面目，我都记不清楚。可是，我从他所遗留的东西之下，我能窥出他的性情，他的一切举动。家中吃饭，非常热闹。每次开饭，都是好几桌。家中时常向外挑战，或任性购物。我听说父亲有一天叫一个工人整日里做马鞍子的绣工，而他自己又不会骑马，等做好后，他请旁人骑，他自己却在后面跟着跑。^⑧

父亲浪漫任性的性格和离奇乖张的举动使丁玲感到有趣，成年以后，她那种洒脱豪爽、浪漫自由的个性里似乎流淌着父亲的血脉，承传了父亲的基因。然而，对家庭来说，父亲留下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却是沉重的债务和苦难。父亲一死，孤儿寡母即刻坠入困顿之中。年幼的丁玲虽然无法理解父亲的死对她的命运意味着什么，却直觉地感到父亲之死所投下的巨大阴影，对于那死的恐怖印象深刻，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能清晰地回忆起她披麻戴孝跟着母亲跪在父亲灵柩前哀哭的情景：

我常想，那时候，我为什么那么痛哭，那样不安静呢？是不是我已经预感到那个时代——那个苦痛的时代，那个毫无希望的，满屋都是白色的，当中放一口黑棺材的时代的结束，那就知道了，反正那是我的第一个印象。家里人后来告诉我，那是死，是我父亲的死。

父亲死了，我母亲就完了，我们也完了，我们家的一切都完了。因此，在我有一点朦胧知识的时候，我对死，就有很深的印象。死是这样可怕的啊！^④

父亲的死的确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且是经由母亲来宣告的。丁玲是不幸的，父亲是个败家子，丁玲又是幸运的，她有个迥异于乃父的颇不平凡的母亲。母亲并没有因父亲之死而就此完结，反而立志开拓一条崭新的人生之路，改变了自身和后代的生活和命运。

丁玲的母亲姓余，闺名曼贞，后改名为蒋胜眉，字慕唐，意为胜过须眉，羡慕唐代武则天当政时女性可以考官做事之意。她于1878年生于湖南常德（旧称武陵）一个封建世家。余家虽是旧家，却是书香门第，较为开放。余曼贞幼年时得与兄弟同在家塾中读书，后又随姐姐们写诗习画、吹箫下棋、阅读报刊小说。她不是那种深居闺阁、足不出户的大家小姐，而是一个有文化知识，有追求识见的女性。她知道法国女革命家罗兰夫人，羡慕外国女人不受缠足之苦，还能参予政事，走上社会，内心里早就滋长了对民主、自由、解放的向往之情。但命运对她如此不公，她嫁给了“一个多病、意志消沉、有才华、却没有什么出息”^⑤的“败家子”，寂寞惆怅、毫无希望地度过了十年时光。丈夫的早死，固然给她留下了无限困难和悲苦，但也成为她改变命运的契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解放了她。此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酝酿的时期，她

的故乡常德县城里有几个从日本学法政回来的年青人倡导各种新鲜事物，兴办女学。1909年她的弟弟来信告诉她“社会上有先觉者欲强家国，首应提倡女学，因女师缺乏，特先开女子速成师范学校，定期两年毕业”，^⑥余曼贞“闻后雄心陡起，我何不报名读书，与环境奋斗？自觉如绝处逢生，前途有一线之光明，决定将一切难关打破……”。^⑦于是，她说服族伯，变卖家产，偿清债务，“即携子女，一肩行李，凄然别此伤心之死，一路悲悲切切，奔返故里常德”。^⑧

母亲将弱女幼子寄居兄弟家中，于次年毅然进入常德女子师范学校求学，决心开拓一条从事教育工作，自食其力，抚育儿女的独立自主的生活新路。1912年又考入长沙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第二年因经济不支而辍学。从此开始了长期的教书生涯，辗转在桃源、常德等地小学任教。走出家庭樊笼的母亲焕发出新的精神光彩，再不是昔日那个悲悲切切的新寡。她在家灯下攻读，在学校广结女友，后来成为中共著名早期妇女运动领袖的向警予就是她的结拜姐妹之一。她们常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励志读书，畅谈男女平等、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日常教课之余，母亲还积极参与和组织进步妇女团体妇女俭德会，为贫困女子创办工读学校。母亲“从一个旧式的、三从四德的地主阶级的寄生虫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向往革命、热情教学的教育工作者”。^⑨母亲坚韧刚毅的品格、可敬可叹的奋斗，给予丁玲很大的刺激，是童年丁玲最大的骄傲，也是丁玲最好的教育，对丁玲的成长及整个人生道路、创作生涯产生了深刻久远、难以估量的影响，丁玲那种倔强抗争、开拓进取，在困厄中顽强求生的精神源头正来自母亲的生命。

幼年丧父、家道中落，使丁玲失去了幸福的童年。然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幸的童年是生活赠予的一份特殊而又厚重的礼物。寄人篱下的生活环境，使她小小年纪就敏于观察，长于体

味：

我从小就喜欢观察人，那是因为我在当年封建社会里没有发言的权利，只能在旁边听。我家庭的组成很复杂，真有点象《红楼梦》，我舅妈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王熙凤；也有人搞枪，招兵买马，占山为王，这又有点象《水浒传》中的人物；也有书呆子和其他各种特色的人，所以我的家庭本身就是一部有丰富内容的小说。家里人都看我不起，因为我是女的，又穷又小，大小事都不让我参预。这就使我有了很好的条件，所谓旁观者清，我可以好好地在一旁观看，仔细考察。所以我对那个封建社会，那个摇摇欲坠即将垮台的旧社会，是确实有些体会的。^⑨

用幼稚的眼睛去阅读生活这本内容丰富的大书，然后放在幼小的心灵中揣摩体察，使她神经纤细、感觉敏锐，她从舅妈能干漂亮、总是带笑的脸上发现了那掩藏不住的使她害怕的冷淡神情，领略到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这一切不但使她较早萌发了对社会、环境的不满和愤懑，也练就了日后她对于人的形貌、动作姿态、语言声调等能过目不忘的本事，这正是从事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夫。

母亲忙于求学，幼弟经常卧病，童年的丁玲益感寂寞。她唯有以书为伴，用读书来打发时间。在小学期间，她就几乎遍读舅父家的藏书：从《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到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以及《小说月报》、《小说大观》等文学书刊。丁玲的母亲善于讲故事。丁玲小时候，害过几次病，她的弟弟也是爱害病的孩子。每当姐弟俩不能在户外玩，唯一能慰藉他们的便是母亲的故事。什么水帘洞、托